

报刊亭不卖报纸卖寿衣

“本来是为了方便大家买报纸杂志的地方，现在全用来私人盈利了。”近日，有市民反映大通苑清华长庚医院附近一处报刊亭卖起寿衣、骨灰盒。记者了解到，该报刊亭已存在两年多，夏天时售卖食品、饮料，今年入冬开始售卖殡葬用品，从未卖过报纸。经营人称会在入春后开始售卖报纸。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工作人员昨日表示，现场查看后已对其断电并责令整改。

市民举报报刊亭不见一张报

“大通苑东二街、清华长庚医院东边，报刊亭变身寿衣店，该有部门来管管吧？”近日有市民网上爆料报刊亭变身寿衣店，便民设施变味成了私人的盈利工具。

1月8日，记者来到大通苑，在太平庄中二街与立水桥北路的交叉路口看到已经“变身”的报刊亭。报刊亭占地5平方米左右，周围被蓝色的铁皮围挡起来，仅在西北侧留着一扇门。门旁张贴着巨大的广告，上书“寿衣”二字，旁边小字写着“24小时一条龙服务”并附上电话号码。在另一侧，则有一个黑色电子屏幕轮番播放经营项目，包括各式寿衣、骨灰盒、墓地、仪容修复、遗体返乡、灵堂布置等与殡葬相关的各种商品和服务。推开报刊亭的门，里边放着寿衣、被子等殡葬用品，不见报纸、杂志，也不见人。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这个报刊亭已存在两年之久，空置了很长一段时间。“去年夏天开业的



时候卖小食品和饮料，卖了一段时间，今年入冬开始卖寿衣。”一居民告诉记者，从报刊亭开业以来，从未见有人卖过报纸或是杂志。“政府给他批的就是卖报纸的地方，他占着公共地盘卖其他东西，太不合适了！”住在附近的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他偶尔会购买报纸、杂志，但如今只能在地铁站内购买。“便民服务不光不便民，现在霸占便道还挡路呢！”

经营者解释寿衣只是搞副业

随后，记者拨通寿衣店经营者崔先生的电话。他表示自己经营这个报刊亭并没多久，“这才刚弄好，开张没多久”。他解释，由于天气寒冷，报刊亭内并无取暖设施，所以他一般并不会坐守报刊亭。“冻得人坐不住，所以也就没法儿卖报纸了。”

之所以选择售卖寿衣是因为报纸难卖，利润很少，“所以大

家都得搞点儿副业来补贴，你看其他报刊亭除了卖报纸也卖很多其他东西。”崔先生表示，他只是暂时不售卖报刊，等到气温回暖就会正式售卖报刊，“等开春了暖和了，这儿也会卖报纸和杂志。”

报刊零售公司将约谈经营者

记者就此联系到北京市报刊零售公司昌平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杨先生表示，曾接到过群众相关举报，检查后也多次约谈该报刊亭的经营者，并要求停止经营。经查，该报刊亭属超范围经营，也没有经营寿衣等殡葬用品的营业执照。昨日记者再次致电杨先生，他表示分公司已联合街道办对附近几处报刊亭进行检查，对属于占用报刊亭用作其他用途的三家报刊亭断电，要求整改，几家报刊亭将在整改之后恢复正常营业。

(据1月11日《北京晨报》)

风眼时评 >>

“报刊亭卖寿衣”角色失范也是一次转型提醒

文 / 杨朝清

作为一种角色失范行为，“报刊亭卖寿衣”让人在情感上和心理上难以接受。报刊亭所销售的报刊杂志，原本可以丰富老百姓的精神家园，现如今报刊亭却徒有其名，“从未卖过报纸”；对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的背离，让没有殡葬用品营业执照的商家超范围经营，将报刊亭用作其他用途。这样的违规行为，理应得到规训和惩罚。

伴随着移动阅读的兴起，报刊亭的衰落成为一种无奈而坚硬现实。在笔者所在的校园里，鼎盛时期有五家报刊亭，报纸杂志也很丰富；现如今，只有两家报刊亭还在不忘“初心”，另外几家早已改头换面。两家依然坚守的报刊亭，销售报纸杂志基本上也挣不上什么钱；曾经的“主业”已经彻底沦为“副业”甚至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急剧的社会变迁，改变了不少人的生存生态，也让一些事物遭遇了“冰火两重天”。报刊亭昔日的火爆局面，如今已经难得一见。将报刊亭用作其他用途尽管不够合理，却是一种“生存理性”——报刊亭进行多种经营是为了收入来源多元化，多挣一些钱。“报刊亭卖寿衣”尽管背离了社会规范，却依然隐伏着商家的利益诉求。

和曾经风靡一时的街头电话亭一样，报刊亭也难以阻挡时代前进的脚步。报刊亭在本质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如何更加便民、利民？报刊亭要坚守“本分”，售卖报纸杂志的功能不能废弃。尽管移动阅读方兴未艾，但依然有一些读者喜欢纸质阅读；尽管报纸杂志的市场需求减少，报刊亭也需要承担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

报刊亭不是不能做“副业”，而是要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

化轨道。没有相关商品的营业执照却超范围经营，这样的自弹自唱需要戴上“紧箍咒”。对于报刊亭而言，既不能只要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却忽略经济功能，也不能只要经济功能却漠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身处变革时代，“报刊亭卖寿衣”尽管不合规矩，却给我们带来了一次转型提醒。作为一个公共空间，报刊亭既要便民、利民，也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报刊亭在售卖报刊杂志的同时，也可以为过往的行人提供一些常用消费品——遵循规范的美德如果没有循序规范的利益的支持，其道德价值就是脆弱的；寻找公共利益和商家利益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将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报刊亭才会更有生命力。

丹凤眼看世界 >>

2009年的浙江桐乡，13岁的初一女生杨玲玲“一夜成名”：当地媒体惊讶其“六年级写成7万字婚恋小说”，省外报纸赞她可能是“下一个张爱玲”，中央电视台也闻讯赶来。热度持续到2013年，她高喊着“要么当作家、要么做乞丐”现身东方卫视，她的“未来”被嘉宾升级为或将成“下一个诺奖获得者”，当这个学习成绩不佳的高中生歪着头说出“我要退学”时，嘉宾惊呼“她在战斗”。杨玲玲最终并未退学，但她所在的桐乡二中已然轰动。事实上，“破格”正是杨玲玲杀入这所高中的“秘籍”。2012年，她的中考分数仅过职高线，可开学不久，这个“少女作家”直奔教育局，此后命运反转。今天，杨玲玲没有叱咤文坛，可依然“迷恋”着“破格”——两度高考，她试图凭文学特长申请读本科，均止步大专；当被四川某“985”高校拒绝之后，她怒而网上筹款，欲提起诉讼，但应者寥寥。一些支持者也开始反对她。

天才与破格的辩证论

文 / 郭丹

人们对于天才的理解，往往与偏才挂钩，似乎在某个领域的出类拔萃，总是会以偏废全，不但不可能全面发展，甚至会成为其他领域的弱势群体。为了让特殊人才有充分的机会实现自我价值及其社会价值，很多学校都在进行制度改革，力求在录取和培养工作中，为天才保持足够的社会上升空间，实质上就是个性教育和基础教育，专业人才的成长和考核机制。然而，我们不能为了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口碑，迎合打着天才的幌子、急功近利、迷失初心的伪天才。真正的天才，其实并不依赖破格录取。负责的破格，更不能对天才盲目放行。

我们常用钱钟书、钱穆、臧克家等大师的先例，号召现代应试教育为天才高抬贵手，让他们能够脱颖而出为社会贡献自己的特殊才能。然而，高考制度似乎依然僵化。原因很简单，高考关乎每一个国民的受教育权，在缺乏界定天才的统一标准和社会认同前，其公平性比成就一段佳话更重要。在把将天才破格录取制度化的问题上，我们还要尤为谨慎，避免引发钻制度空子、急功近利的伪天才潮。杨玲玲的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实际上她的天才梦远盖过她的天价值，她的天才头衔里功利色彩远远超过她的真实才华。

的确，我们需要对天才给予足够的包容，前提是我们必须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特殊才能？13岁的年纪写出的婚恋小说，缺乏应有的生活阅历和真实经历，这是想象力而不是特殊才能。遗憾的是，在当时浮夸的舆论宣传刺激下，这种想象力被夸大和膨胀，不仅没有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才能反而朝着功利化的方向背道而驰。当她目空一切地喊着要退学、理直气壮地要求天才待遇、少年老成的运筹天才战略时，更是天才幌子下赤裸裸的急功近利。可以说，今天坚决不为杨玲玲开破格之门，不仅不是对天才缺乏包容，恰恰是出于对天才的最大尊重和保护，更是对教育公平和价值导向的最大保护和坚持。唯有无情浇灭杨玲玲走火入魔的天才梦，才能让她以及千千万万的学子们勿忘初心、不离真情、不偏正规、不忘真才。

可以说，杨玲玲对破格的痴迷，幕后操手的关系功不可没。这个幕后操手有媒体，为求标题效应过度宣传，是杨玲玲虚妄的开始；还有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对其出格行为的消极应对，是对杨玲玲不负责任的纵容；当然还有家长和教师以及提供推荐信等诸多专家们，他们或粗暴或敷衍或被动的引导方式，让杨玲玲孤身一人在偏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我们更加不能一错再错，以大开方便之门等同于包容、以破坏教育公平弥补曾经的失职、以模糊人才标准标榜所谓的不拘一格，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会损失高校的学术声望和教育产出，更会极大扭曲以杨玲玲为代表的学子们应有的价值观和人才观，迷失在天才功利的陷阱里难以自拔。

我们要明确一个观念，天才培养和基础教育绝不矛盾、更不悖离，这世界虽然百花不同，却都是根深方能叶茂。我们切不可忽略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把天才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更不能在天才的光环里难以自持用破格代替了最重要的淡泊自守和刻苦钻研。我们需要制度的弹性给钱钟书们这样的天才们保留成才的空间，更需要制度的刚性让杨玲玲这样的偏执者迷途知返，避免让伪天才钻了空子，堵塞了真天才的制度通道。